

PART

One

第一部分

理论探讨

本书第一部分是理论探讨，共包括三章。第一章是对功能文体学理论在文体学的历史发展中和在现代文体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文体学理论的关系的探讨。功能文体学是众多文体学理论的一种，是文体学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也与其他流派的文体学理论具有互补关系。功能文体学虽然与布拉格学派的文体学理论有一定渊源关系，但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除了为功能文体学提供整体理论框架外，同时还提供功能的思想、语境的思想、层次的思想、符号的思想和近似和盖然的思想等。本章还简略描述了功能文体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趋势。

第二章是对文体特征和文体分析理论和方法的论述。功能文体学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来描述语言的文体的，所以首先应该确定功能文体的定义和特点。功能文体简言之是“有动因的突出”，即是前景化的突出，它有六个特点：层级性、独特性、比较性、相对性、功能性和分级性。功能文体是以语言的意义、形式和实体为载体的，所以在这些层次上有形成功能文体的潜在特征。

本章重点探讨功能文体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包括文体产生的动因：语境和文化因素，以及语言的基本功能；文体产生的方式，包括失衡突出、失协突出和相关性标准的建立。本章还探讨文体学研究的出发点，功能文体学的分析程序和方法，以及功能文体学研究中存在的有争议的问题等。

第三章是对作为文体产生的主要源泉的语言变体现象的描述。语言的文体是以其独特性而存在的，在语言运用中集中表现为语言的变异性。语言的变异性是与语言的共核特征相对的，是从共核中心向不同领域的辐射而形成的。语言的变异性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定义：一是根据使用者来定义的变体，称为“方言”，一是根据用途定义的变体，称为“语域”。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中，方言和语域都成为语域特征，即与语言交际相联系的变体特征，并由此成为文体特征。

语言变体都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有些特征具有比较广泛的共性，是某个文化语境中的共性特征，有的则具有语类共性特征，是某个语类所共有的特征，而有的则只能表示语篇的独特性。所以，文体特征也具有不同的价值。

第一章

功能文体学概述

1.1

从功能角度看西方文体学的发展历史

1.1.1

西方古典修辞学

西方文体学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 (rhetoric)。语言的文体与功能之间的渊源关系从文体学诞生之日起就已形成。在古希腊时期修辞学指的是演说术,包括立论和词语的修饰。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在其相关论著中明确指出演说的主要目标是“打动听众”、“影响听众”、“劝说听众”等。他说:“要打动听众,一要靠内容,二要靠文辞,三要靠演说技巧。”显然,内容、文辞和演说技巧都是为打动听众的修辞手段。

后来,罗马修辞学家西赛罗 (Cicero)和昆提良 (Quintilian) 等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们设计出了修辞活动的全部过程和程序,并提出了“五艺说”。这五艺指劝说性演讲的五个阶段:(1)材料准备 (inventio);(2)篇章设计 (dispositio);(3)文体风格 (elocutio);(4)记忆 (memory);(5)宣讲 (delivery)。演讲者通过五艺生成论辩话语,又通过声波传递给听众。

古典修辞学家认为,运用五艺必须能产生劝说吸引力、情感吸引力和人品吸引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材料准备阶段,首先应考虑的是理性吸引力。但在有效的论辩中,只有理性吸引力还不够,还必须有情感吸引力。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所有的演说都由引言 (proem)、叙述 (narrative)、立论 (argument) 和结尾 (peroration) 四个部分组成。引言应有伦理吸引力和情感吸引力;立论应合乎逻辑;结尾应进一步体现情感吸引力和伦理吸引力。

所谓“文体风格”就是采用特殊的语言手段来表达思想。亚里士多德倾向于把修辞学研究 with 文体风格研究等同起来,从而引发了对修辞格的研究。

“记忆”表示演讲辞是有准备的,不是即席发挥的。“宣讲”指演讲时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对演讲的效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古典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它把言语与社会、听众、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和伴言语行为联系起来,把言语修辞手段看作修辞手段的一种。修辞研究中所涉及的诸因素又都与言语功能——演讲在听众中的效应和影响——联系起来,并为此服务。

1.1.2

从中世纪至启蒙时期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修辞学的人文主义传统逐渐弱化，诡辩主义^③越来越占上风。他们强调就修辞论修辞的重要性，认为演讲的熟练(deftness)、技巧(skill)和机敏性(cleverness)比论据和立论充足更重要。

在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可分为三派：(1)传统派，仍以五艺说为研究内容；(2)拉莫斯派，把材料准备和篇章设计归为逻辑学，而只把文体风格和宣讲作为修辞学的研究内容；(3)修辞手段派，以研究辞格和比喻为其主要兴趣。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派，从研究范围上讲，一派比一派狭窄；后两派逐渐背离了修辞学的功能传统，而且后两派比较占上风，特别是以法国哲学家佩特吕斯·拉莫斯(Petrus Ramus)为代表的修辞学派。

然而，到了十七世纪的启蒙时期，传统的修辞学与历史、诗歌文学研究和美文学(belle lettre)密切联系起来。古典修辞学的规则被应用到对文学的评论方面，从而使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得到扩大，功能传统得到发扬。

1.1.3

现代文体学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是西方修辞学研究的低谷期。修辞学的范围迅速缩小，其劝说功能逐渐消失，代之以“文章写作”的规则。修辞学发展成为一套规定性的规则。修辞学与演说术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纳斯菲尔德(Nesfield)的《作文与修辞》(Composition and Rhetoric)就是这类研究之一。另外，修辞研究大都是注意表达形式，费尽心机地寻求新辞格，或作些别出心裁的分类。语言的功能和作用被置于修辞学的研究之外。

然而，在20世纪初，伴随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语言风格特点的现代文体学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与现代修辞学并行的，且比其规模更大的古典修辞学派生的分支。西方现代文体学的创始人当推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巴依(Charles Bally, 1865—1947)。索绪尔(Saussure, 1916)区分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抽象的语言，而非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言语。于是巴依力图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补充，他运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口头语言的文体，探讨人们在日常会话中如何借助种种表现手段将抽象的语言变为具有情感效果的言语，并以此分析语言的整个表达方式系统。

^③ (Sophism) 指用以欺骗或炫耀学问的，看起来可能，但实际上是假的推理。诡辩学家是古希腊专门研究逻辑、哲学和修辞的学者。后来，诡辩学家强调物质成功，和不论是否真理，都可使论辩成功的能力。

以斯皮泽(Leo Spitzer, 1887—1960)为代表的“心理文体学派”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把文体学看作连接语言学与文学史、艺术史以及文化史之间的桥梁,提出了语言分析与文学阐释之间的“语文圈”(philological circle)概念。也就是说,从作品的语言细节入手,找出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语言特征,描述作者的写作心理,再回到作品细节中予以证实;旨在通过对文体特征的研究考察作者的精神,从而挖掘一个民族的精神。

俄国的结构主义学派和布拉格学派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结构,一个符号系统,其文体特征只能存在于作品本身;语言分析在文学作品研究中占有支配地位,对文学价值的认识程度也取决于语言学知识。布拉格学派的哈弗拉奈克(B. Havránek)在研究标准语时提出了理性化(intellectualization)、自动化(automatization)和前景化(foregrounding)等概念,同时讨论了标准语的功能。穆卡罗夫斯基(Jan Mukařovský)对标准语言和诗歌语言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前景化是自动化的反面,即非自动化(„deautomatization”),“一个行为越是自动化,实施起来越是无意识。一个行为越是前景化,实施起来越是有意识。”(钱军,1998:151)。纯粹的标准语是排斥前景化的,但在实际的交际中,标准语中也存在前景化。例如,在新闻报道和诗歌中都存在前景化现象,作者通过前景化的表达手段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新闻报道中是为了使读者注意讨论的主题,达到交际目的;在诗歌中是为了把表现的行为或者所使用的语言置于前景中,取得最大的突出效果。布拉格学派的雅柯布森(Jakobson)从语言的功能角度把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分析从结构描写引向功能分析。

哈弗拉奈克(Havránek, 1932)在讨论标准语时讨论了功能文体(functional style)概念,认为功能文体是由某一话语的具体目的所决定的,是某一语言行为的功能。根据交际目的的不同,他把功能文体划分为五种:(1)客观信息交流文体,表示就事论事的功能;(2)规劝功能;(3)一般大众化的解释;(4)技术性解释;(5)代码化阐述。他还试图把语言功能和语言文体等同起来,把语言材料按照表达真(Truth)、善(Good)、美(Beauty)的不同侧重点提出三种不同的文体:逻辑文体、道德文体和美学文体。他还认为,文体在语篇中的功能是把语篇结构结合起来,其他为次要功能,包括美学功能、语义功能和区分功能等。

1958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举行的“文体学会议”(Conference on Style)是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文体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并将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体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新学派、新观点不断涌现。其中有系统功能学派、转换生成学派、语用学派、层次语法学派等。文体分析的方法更加精密;文体研究的范围已从单纯研究文学语言扩大到研究多种语类的语言。一些新的语言学流派,以及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话语分析等学科的新方法和新概念,如语域概念、

方言概念、情景概论、对常规的偏离 (deviation)、数理统计方法、话轮转换等，都连续不断地运用于文体学研究，对文体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语言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批评语言学发展迅速，促使揭示语篇中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

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讲，研究演说的劝说力的古典修辞学仍在某些地方流行，如在美国的某些大学里。从现代文体学的角度讲，以巴依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布拉格学派和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学派都在范围更广泛、层次更深刻、理论更系统、完整的框架中坚持了古典修辞学的功能传统。

1.1.4 文体学与修辞学

虽然从历史的渊源关系上讲文体学是在修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学者们仍对两者的关系意见不一。有的认为修辞学是古代人的文体学 (Guirand, 1963)，文体学是现代人的修辞学 (Ulmann, 1966:3)；有的认为文体学与修辞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Leech, 1969)。还有的把文体学看作修辞学的一个分支，是古典修辞学派生出来的“文体风格传统在本世纪的新发展，是新修辞学的一个分支”(顾曰国，1990)。

文体学和修辞学的关系可以从两者各自的研究重点上看出来。古典修辞学所关心的是演讲的准备(准备材料、构思布局)、过程及其方式，如“恰当的表达方式”“文辞”“演讲技巧”(Aristotle, 1989)，而现代文体学主要关心的是对语篇的分析和鉴赏。由此可见，修辞学和文体学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同一事物。修辞学主要是针对演讲或写作的过程而言的，包括这种过程的准备阶段和进行阶段，重点研究语篇的生成，讲话者或作者的对语言的选择过程和选择方式、方法和技巧等，强调修辞是一种过程或活动。这样，有关写作和口语的研究通常把重点放在修辞学的研究上，即运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来提高写作和口语表达的效果。文体学则重点探讨语篇对听话者或读者的影响。它把语篇视为产品或结果，然后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看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应。这样，有关阅读和听力的研究通常把重点放在文体学的研究上，即研究语篇的语言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等。

修辞学在古代重点研究演讲和劝说辞，在现代主要研究写作的方式和方法，而文体学则主要研究语言所表达出来的特点 (Leech, 1981: 12) 包括作者的个性特点、语篇本身的特点、读者的感受等。文体学常用于文学批评和研究各种语类的语篇的文体，如正式文体、非正式文体、委婉文体、书信体、18世纪小说文体等。

由此可见，文体学和修辞学是相互交叉的学科，其主要区别在于其研究重点的不同。然而，在实际的语言活动中，语言的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是同时的，相互交叉的，而不是这一过程结束、另一过程开始的现象。所以，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常常不区分过程和结果，或从结果来研究过程，或根据过程来推测结果。这样两者就变得难以区分，或将一种包括在另一种之中。由此，文体学和修辞学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体学包括狭义的修辞学，但重点在语篇产生的效应上。也就是说，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知道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其产生的效果，有必要研究作者选择什么样的语言，以及选择这些语言特征的动机和目的，从而进入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广义的修辞学也包括语篇生成的全过程和结果，由此，也包括狭义的文体学，但重点在语篇的生成过程上。也就是说，在研究作者如何在语篇的生成过程中有效地使用语言时也要研究这些选择的语言特征能够在读者或者听话者心目中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从而对语言的产出过程起到一定反馈作用。这样，修辞学和文体学可以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进入对方的研究领域。但在语篇生成过程中研究语言的文体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语篇的生成过程。

本书不对文体学和修辞学加以区分，而是根据需要或侧重过程，或侧重结果，进行文体分析。

1.2

文体学理论模式比较

1.2.1

文体学分类

依据研究内容，我们可将文体学分为普通文体学和文学文体学。文学文体学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及审美价值，又称为狭义文体学；普通文体学研究包括文学文体学在内的所有语言变体，如新闻文体、法律文体、广告文体等，又称为广义文体学，本书以由文学文体和实用文体组成的普通文体学为研究对象。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文体学又分为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文体学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是“通过对文体和语言的研究来改进分析语言的模式，从而推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文学文体学“旨在为更好的理解、阐释和鉴赏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提供根据”；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是指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为目的的文体研究(Carter & Simpson, 1989:1-17)。

现代文体学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特征予以描述并作出解释的一门边缘学科。当今语言学理论分为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代表的形式

语言学和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两大阵营，此外，随着语言学家对口语语篇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学和话语分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日常会话模式，如格赖斯(Grice, 1975)的会话合作原则、利奇(Leech, 1983)的礼貌原则以及伯明翰话语分析法(Sinclair & Coulthard, 1975)等，因此根据文体分析模式所依据的语言学理论，我们可把文体学分为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和话语文体学。

1.2.2 形式文体学

形式文体学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理论依据，乔姆斯基(Chomsky, 1957)区分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performance)，指出语言能力是说某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语言的规则的内在知识，而语言行为是指对语言的具体运用，语言行为依赖语言能力。形式语言学是关于句子语法，关于语言能力的语言学理论。形式主义认为，语言的生成就是语言能力从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通过转换规则到达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的语言行为，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转换规则。

奥曼(Ohmann, 1964)是形式文体学的开创者，在其《生成语法和文学文体的概念》(Generative Grammar and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Style)一文中提出了文体学的转换模式。奥曼认为深层结构是意义资源，转换并不会改变深层结构的意义。文体是一种写作方式；一个深层结构可以转换成不同的表层结构，使得作者能够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说，两个表层结构由意义相同的同一个深层结构派生而来，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表层结构就是文体的差异。例如，He closed the door. 和 The door was closed by him. 表达同样的命题内容，即它们的意义都是“门关上了”，然而它们的文体风格却迥然各异，前者使用主动句，而后者使用被动句。

奥曼用他的转换模式分析了风格迥异的海明威和福克纳两位作家的作品，发现两位作家风格的差异源自他们倾向于不同的转换规则；海明威更多使用删除规则(deletion rules)而福克纳较多运用添加规则(additional rules)这就是为什么海明威的作品用词简约，句子以短句为主；而福克纳的作品用词华丽，句子结构复杂。

形式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科学化的理论，而这种形式主义的科学化抹杀了文体的人文性，所以形式主义文体学家认为，语篇的表层结构特点可以回归到一种由深层结构表现的基本意义(essence)，意义相同的不同语篇是存在的。形式主义对共性的关注决定了对体现个性特征的文体学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形式文体学认为语言风格只能从可以观察到的语言单位中获得，而忽视了文

化和社会语境的决定因素。这一点也禁锢了形式文体学的发展。最后，文体学是一门关于语言使用的学科，形式主义对语言能力的重视不利于形式文体学理论的发展。形式文体学的种种不足为关注语言变异性的功能文体学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2.3 功能文体学

功能文体学是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的文体学理论。系统功能语法包括两个部分：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和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系统语法把语言视为系统，重点说明语言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s)，亦称“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功能语法研究语言选择的过程或结果，是对语言结构在语篇中的功能的研究。

1969年韩礼德在意大利召开的“文学文体讨论会”(Symposium on Literary Style)上宣读了《语言功能与文学文体》(Language functions and literary style)(Halliday, 1973)一文，该文强调意义在文体研究中的作用，讨论语言的功能理论与文学研究的文体相关性。语言的功能理论是指语言具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三大元功能，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的解释都围绕这三大元功能展开。在这篇论文中韩礼德把文体视为“前景化”，即“有动因的突出”(motivated prominence)。该文运用体现概念功能的及物性系统对戈尔丁(Golding)的小说《继承者》(The Inheritors)的文体分析被奉为文体分析的典范。

韩礼德功能文体学理论的核心是“功能思想”。韩礼德认为语言结构是在交际过程中根据其使用功能发展而来，并将语言的功能归纳为三个元功能，所有的语言结构都可以从这三大功能给予解释。功能思想把语言形式和情景语境联系起来，有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把握语篇的文体特点。对情景语境的关注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另一重要思想，与语言的三个元功能相对应，韩礼德抽象出情景语境的三个组成部分：语场(field of discourse)、基调(tenor of discourse)和方式(mode of discourse)。功能语法理论的系统性为我们系统地进行文体分析提供了语言学理论框架，这也与功能语法的创建目的有关，因为功能语法是“为那些以语篇分析为目的的语法学习者而编写的”，“从功能体现的角度解释语法结构和语篇分析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Halliday, 1994: x)，而语篇分析是文体分析的第一步。

根据韩礼德的“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这一指导思想，以克莱斯(Kress, 1985)和福勒(Fowler, 1986)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以功能语法作为分析工具，

研究语篇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进一步把语篇引向社会文化环境，大大扩展了功能文体学的研究范围。

1.2.4 话语 / 语篇文体学

话语 / 语篇文体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语用学和话语分析以及篇章语言学的发展，采用话语分析模式进行文体分析的文体派别。语用学、话语分析和篇章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大致相同，它们都以句子以上的单位——语篇作为分析对象，如研究句子间的衔接，话轮间的关系和规律，语篇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等等。因为话语 / 语篇是一个交际单位，所以三者都注重交际双方的相互作用过程，即话语是如何产生的。此外，语用学、话语分析和篇章语言学都是新兴学科，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式。主要的理论模式有格赖斯 (Grice, 1975) 的会话合作原则、利奇 (Leech, 1983) 的礼貌原则、伯明翰话语分析法 (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以及韩礼德的衔接理论等 (Toolan, 1990) 话语 / 语篇文体学家常常根据需要，综合采用多种分析模式。

格赖斯认为，人们在会话时一般遵循四项合作准则：数量准则（提供适量信息）、质量准则（提供的信息要真实）、相关准则（说话要相关）和方式准则（说话清楚、简洁、有条理）。会话双方运用这些准则来产生或推导出会话含意。文体学家可以依据合作准则，分析会话双方如何相互作用而产生会话含意。肖特 (Short, 1989:138-168) 在《话语分析与戏剧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Analysis of Drama) 一文中展示了如何运用合作原则及其他相关概念更好的理解戏剧语言的“可笑性” (absurdity)。

会话中还有社会道德准则需要会话参与者必须遵守以保证交际的成功。由此，利奇 (Leech, 1983) 提出礼貌原则问题，讨论了为保持自身、他人或受话者的面子而采取的谈话策略。礼貌问题常常和谈话双方的社会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如对方地位越高，说话者的礼貌程度越强；对话双方社会距离越大，说话者的礼貌程度越高。通过对不同的礼貌原则的探讨，可以揭示人物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辛普森 (Simpson) 运用礼貌原则展示了语言是如何标记人物间的角色关系的。

伯明翰话语分析法是借鉴韩礼德的阶与范畴语法等级模式（句子——小句——词组——词——词素）建立了五层次话语模式 应对 interaction——话段 transaction——回合 exchange——话步 move——行为 act)。该分析模式是英国伯明翰大学以辛克莱 (Sinclair) 和库尔特哈德 (Coulthard) 为代表的语言学家提出的 (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伯明翰话语分析法的分析重点是回合、话步和行为，特别是话步。通过对话步分布的分析，可以观察会话双方的权

位关系。图伦 (Toolan) 运用伯顿 Burton, 1980)对“ 开题话步 ”、“ 支持话步 ”和“ 挑战话步 ” 的区分, 对乔伊斯小说中人物对话进行了分析, 发现乔伊斯使用大量挑战话步来表现人物间的冲突 (Toolan, 1989)。

话语文体学与功能文体学有很多相通之处。两者都重视语境的作用, 以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 以语言在语境中的使用为研究目标。在话语分析的理论模式中不乏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如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信息理论、语境理论等。功能文体学与话语文体学不同的是, 前者除了关注语境因素对文体的选择, 对词汇语法结构同样重视, “ 没有建立在语法描述基础上的语篇分析不能称之为分析, 只不过是空洞的泛泛评述而已。 ”(Halliday, 1994: xvi) 而后者主要关注句子以上的交际单位及句际关系, 其理论模式也缺乏系统性。所以, 我们可以说如果以系统的功能文体学为主要理论依据, 结合相关的话语分析模式, 将为文体学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1.3

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功能文体学的理论基础

1.3.1

功能的思想

语言的系统是经过漫长的语言运用形成的。语言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求得发展, 并通过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功能而形成语言结构。语言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 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对功能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或层次上划分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935)把语言功能从总体上分为两类: 实用功能 (pragmatical) 和魔术功能 (magical)。前者指语言的实际用途, 可再分为“ 行动功能 ”(active)和“ 叙述功能 ”(narrative); 后者指语言用来进行文化仪式宗教活动的功能。奥地利心理学家布赫勒 (Buhler, 1934) 把语言功能分为三类: 表现功能 (representational), 是第一人称功能; 表情功能 (expressive), 偏向讲话人的功能; 意动功能 (conative), 偏向听话人的功能。韩礼德 Halliday, 1978:144 则区分三种功能: 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谋篇功能。概念功能是讲话者作为观察者的功能, 表达人们的社会经历和内心的心理经验, 同时也表达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人际功能是讲话者作为参与者的功能, 表达意见、态度、评价及与听话者的角色关系, 包括社会角色关系和交流角色关系。谋篇功能是讲话者作为组织者的功能, 它根据情景语境把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在语篇中组织成一个整体, 共同在语境中起作用。

以上几类功能划分方式之间的区别可由表 1-1 表示。

表 1-1：功能分类比较

| | | | | |
|--------|----|----|----|----|
| 马利诺夫斯基 | 实用 | | | 魔术 |
| | 叙述 | 行动 | | |
| 布赫勒 | 表现 | 意动 | 表情 | |
| 韩礼德 | 概念 | | 人际 | 谋篇 |

需要指出的是，韩礼德之前的学者所指的语言功能是语言的外部功能，指向语言外部，是语言完成某种任务所具有的作用。韩礼德所提出的三大功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是语言的内部功能，指语言结构形成的组织原则，因而被称为三大元功能。所以说，韩礼德的功能概念与语言结构分析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对语言解释有着更强的说服力。

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说话者根据情景语境从由这三类意义组成的语言系统网络中做出选择。对意义层的选择促动了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从而形成了语法结构。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促动了对音系系统（或字系系统）的选择，从而形成了音系（或字系）结构。

这就是说，在系统网络中选择出的特征通过体现规则或说明，形成不同层次的功能结构。在词汇语法层，体现意义的基本单位是小句（clause）。它是一个多变功能结构，同时体现多种语义结构。语言的概念功能主要由及物性结构和词汇的实义部分来体现；语言的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结构、情态、语调和词汇中表达情感和态度的部分来体现，语言的谋篇功能主要由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语篇内部成分之间的衔接来体现。除词汇项目外，这几种体现不同功能的结构都主要是以小句为基本单位的（见表 1-2）。

表 1-2

| | | | | | |
|------------|------|--------|---------|-----------|--------|
| 结构 | He | spread | | his claws | neatly |
| 系统 | | | | | |
| 及物性 | 行为者 | 物质过程 | | 目标 | 情景 |
| 语气 | 主语 | 限定成分 | 谓词 | 宾语 | 附加语 |
| | 语气 | | 剩余部分 | | |
| 主位 | 主位 | 述 | | 位 | |
| 信息 | 已知信息 | | ——▶ 新信息 | | |

虽然小句是体现语言的三大元功能的基本单位，但不是惟一的单位。实际上，这三大功能可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次和级阶上。在词级、词素的选择以及词在词组中的排列顺序、不同级阶的单位的群（complexes 结构组成方式都具有特定功能。下一节我们将对各层次、各级阶的语言单位的功能作较具体的介绍。

韩礼德认为，所有三种功能都同时存在于讲话者的语篇组织计划内。这三种功能相对来说是独立的。三种功能组成三种意义资源。讲话者在讲话过程中要根据情景语境同时从这三种资源的系统网络中做出选择。所有从这三种意义中做出的选择都对语篇的文体有意义。

因此，韩礼德不同意把文体只作为一种表达，而与概念意义，或称认知意义对立起来，把文体视为没有意义的特征。他认为这一方面与我们的许多文学文体是以经验意义为基础的感受不一致，另一方面，也把所谓的“非认知”的文体特征置于与那些最贴切地表现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的语言选择相对立的地位。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语篇的意义领域内区分文体特征和非文体特征。没有不存在文体的语言领域。文体特征与非文体特征之间的界限不是明确的，而是重叠、明暗和多寡的区别。

他指出，语言功能在文体分析中起“中介”作用。语言形式，包括语法结构、语音结构等自身不能表明是否与语篇的文体相关，而是通过它在语言交流中“价值”(value)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看它是否在语篇整体中起突出(prominence)作用；在文学作品中，由于决定语篇内容的语篇情景是作者在创作中创造出来的，所以要看它是否与表达作者的整体意义相关。这样，语言功能就成为连接语言形式与情景语境的中介。

韩礼德虽然只分析了《继承者》中体现概念功能的及物系统。但他后来指出，三个元功能中的任何一个或其语法或语音体现形式都有可能在语篇中被突出，而我们建立的是贯穿语篇始终的元功能形象(profile)或进程(progression)，正是这些模式的相互交错形成的独一无二的结合赋予了该语篇的特色。我们区分语言的三大功能是为了理解为什么该语篇能表达它所表达的意义，而当我们解释为什么该语篇体现了它的价值时，我们需要把它们整合在一起(Halliday, 1987 in Birch & O'Toole, 1988)。

1.3.2 层次的思想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由三个主层次组成。这三个主层次分别是情景、形式和实体。情景指与语言活动相关的环境、事件、人物、交际方式和渠道等。它使语言在交际中发挥其功能，是语言活动产生的动因和环境。形式把实体成分排列成可辨认的、有意义的模式，包括两个次层次：词汇和语法。词汇指语言的个体项目和个体项目组成的模式；语法则指语言项目的类别和由不同语言项目的类别组成的模式。实体是语言的“原材料”，指语言的载体：讲话的声音和书写的符号。研究语音符号的科学称为语音学(phonetics)；研究书写符号的科学称为文字学(graphetics)。情景与实体从实质上讲是非语言的。

前者是语言运用的环境，后者是语言的载体。

在情景、形式和实体三个主层次之间还有两个中介层次：音系 (phonological)层或字系 (graphological) 层和语境层。音系层或字系层是把实体和形式联系起来的层次。音系层联系语音实体与形式；字系层联系文字实体和形式。研究语音符号与形式的关系的科学称为音系学 (phonology) 研究文字符号与形式的关系的科学称为字系学 (graphology)。语境把语言形式与情景联系起来，由此产生语境意义，即语言的词汇语法与情景的关系。所以，语境层就是语义层。语言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可用表 1-3 表示：

表 1-3: 语言各层次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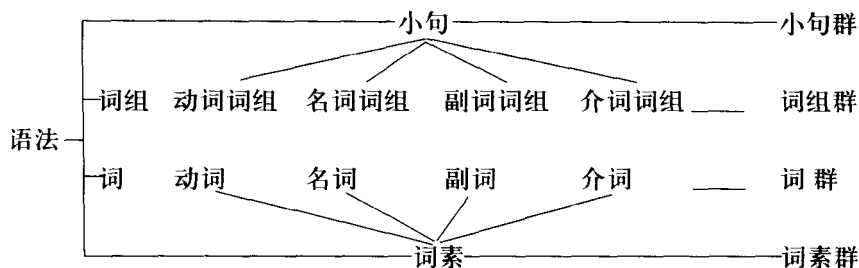
| 语音学 文字学 | 语 言 学 | | | 情景 |
|------------|-------|--------|------|---------|
| 实 体 | ←→ | 形式 | ←→ | (非言语特征) |
| 声音的 | 音系学 | { 语法 } | (语义) | |
| 书面的 | 字系学 | { 词汇 } | 语境 | |

语言系统包括语义、词汇语法和音系或字系三个层次，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语义学、词汇语法和音系学与字系学。那么，文体分析中所涉及的层次有语义、词汇语法和音系 / 字系，每个层次又可分为不同的级阶。语义层共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概念意义又可分为经验(experiential)意义和逻辑(logical)意义两个部分。

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分为词汇和语法两个部分。伯利(Berry, 1975)认为“词汇与语言的个体项目，以及这些个体项目所出现的模式相关”。这里所说的词汇模式就是词汇的搭配 (collocation) 关系。词汇系统是由词汇的搭配和集 (set) 来组织的。搭配和集是相互依存的概念，具有搭配关系的词组组成词汇集。同一词汇集的词汇具有搭配关系。搭配关系是一种语义关系。形成词汇搭配关系的方式有三种：重复、同义和搭配。重复指词汇项目的 (不断) 再现；这里的同义关系是广义的同义关系，指所选择的词汇项目的意义与前面的某个项目的意义有相同、相似、相近或相反的关系。伯利(Berry, 1975)认为“语法涉及语言项目的类别和不同类别的语言项目出现的模式”。“不同类别的语言项目”组成语言的语法系统。对语法系统的选择，形成不同的语法单位，或称语法结构，即“语言项目出现的模式”。各个级阶之间的关系可由表 1-4 表

示：

表 1-4



这样，每个单位类型（小句、词组、词、词素）本身都是一个结构组成成分，一个结构结合体，其中的每个结构都是从语义组成成分中派生出来的。

英语的语法系统包括四个级阶：小句、词组 (group)、词和词素 (morpheme)。小句由词组组成，它是一个多变结构体，是同时体现三种元功能的结构组合，包括主位结构、语气结构、情态和及物性结构。小句一般由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副词词组、介词词组等组成，词组由词组成。词素是语法层的最小单位，即“内容层面”的最小单位。一个词可以由一个或多个词素组成。词素的类别可根据其在词及其他单位的结构中的功能进行多角度划分，在此不作详述。本书主要以词的构成方式为基础来探讨词素的文体功能。

在词汇语法层，群结构包括词素群、词群、词组群和小句群。其中小句群就是传统术语中的句子，是结构关系最复杂的一个语法结构单位。而词素群不能独立于词之外，只能是词的内部构成成分。系统功能语法认为，在不同级阶的群结构中都有两种类型的关系。一种是相互依赖关系 (interdependency)；一种是逻辑语义 (logico-semantic) 关系。相互依赖关系又分为两种：(1) 修饰关系 (hypotaxis)，一种成分修饰另一种成分，两者的“地位”不同；(2) 并列关系 (parataxis)。逻辑语义关系也分为两类：(1) 扩展 (expansion)，即第二个小句扩展第一个小句的意义；(2) 投射 (projection)，即第二个小句是由第一个小句投射出来的。

英语的音系学由四个级阶组成：音位、音节、音步和调群。英语的音系系统可描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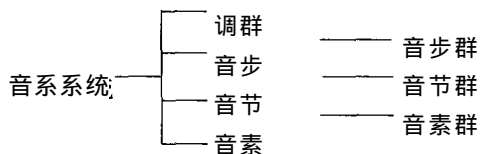


图 1-1

语调和语法中的语气结构具有相同的功能，是语气结构的伴随特征或补充特征。

研究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科学称为“字系学”。字系系统是由五个级阶组织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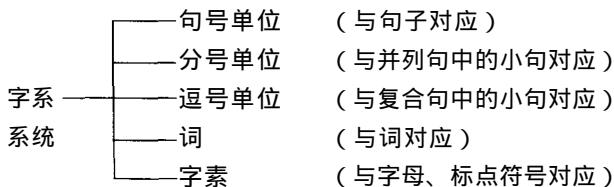


图 1-2

语言的各个层次之间是体现和被体现的双向关系，也就是说，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说话者根据情景语境在由概念、人际和谋篇三类意义组成的语言系统中进行选择。对意义层的选择促动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从而形成语法结构。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促动对音系系统（或字系系统）的选择，从而形成音系（或字系）结构。另一方面，听话者获得语音/文字后，对其进行语法规则词汇解构，从而理解语言的意义，了解对方的意图。语言组织的每个层次在语篇中形成各自的意义方式（mode of meaning），因而我们的文体分析不仅可以在语篇的各个层次上进行，而且可以从语篇生成和语篇理解两个角度进行。同时，体现关系把语篇带入一个更高层次——语境，使语言与其发生的相关情景联系起来。

1.3.3 语境的思想

语境指语言运用的环境。作为整个语言系统的社会环境的语境称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作为某一交际事件的环境的语境称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情景语境是文化语境的具体体现。换句话讲，文化语境是由无数具体的情景语境实现的。

人类能用语言进行交际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类行为即可以由语言来表达——此为语言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也可以是语言本身——此为语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各个言语社团都通过语言实现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并通过语言实现自己的社会结构。语言既有反映和传播社会文化的功能，也具有创造社会文化的功能，是体现社会文化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它被认为是体现人类的“行为潜势”(behavioural potential)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也就是说，在社会交际中，语言可以把人类能做的事变成他们能表达的意义，然后又把他们能表达的意义变成他们能说的话，即语言的词汇和语法。

文化语境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对语言系统起决定性作用。从生物学

的角度看，如同我们都具有直立行走的能力一样，我们也都具有学说话的能力。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每个个体的人又都是特殊的，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模式不同。然而，这种由个体经历的不同所引起的个体的特殊性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人类的环境是由文化定型的；人类学习语言的条件也主要是由文化来决定的。例如，在汉语环境中成长的人要讲汉语，学习汉文化。汉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化也是给人类的行为模式定型的决定因素，并且人类的大部分行为是由语言作媒介的。例如，少儿是在人们按照一定的文化常规行事、父母指导、与别人交际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母语的。这样，在他学习母语的同时，也学到了本族文化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

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认为，决定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模型的主要是社会结构，是家庭和其他社会团体中的社会关系。“讲话的某些风尚，某些连续性的模式可以出现在任何语言中。”这些讲话风尚，语言形式或“语码”(codes)本身就是社会关系形式的功能。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关系形式，或者说社会结构形式，制约不同的语言形式或语码，这些语码主要传播文化和控制行为(B. Bernstein, 1971)。

这种语码或讲话风尚本身不是词汇语法系统，不是口音或方言变体，而是决定讲话者选择意义、听话者解释意义的符号组织原则，是决定语域的因素，在情景类型中决定意义的选择。因此，它是保持和传播社会文化的方式或组织原则。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发现已成为社会常规的讲话风尚、讲话习惯、人们共有的假想等与语言形式之间的系统关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无数不同的情景。这些情景可以归纳为数目有限的情景类型(situation type)，例如：母亲给孩子讲故事、顾客在商店买东西、教师在教室里上课等。社会文化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情景类型来表现的。这些情景类型与语言的“意义潜势”相联系，从而在语言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变体，称为“语域”(register)。

语域概念表示，我们所说或写的语言要根据情景类型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语域研究的目标与文体学研究的目标在一定意义上是一致的：就是要发现控制这种变化的原则，以使说出的语言得体、地道。这类原则就是在情景语境的激发下控制语义选择的一组文化的、逻辑的和传统的、约定俗成的因素，即“语码”。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这种变化的特点还知之较少。不过在这类控制因素的研究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一定成绩。除伯恩斯坦的“语码”理论和韩礼德的“语域”理论外，还有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语用学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侧面对发展这类控制因素做出了贡献，如格莱斯(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奥斯丁(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